

引 子

巴黎。

圣日耳曼大街拐角处的一家食品杂货店。

很久以前，这里曾是希腊咖啡馆。这咖啡馆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

从故乡圣彼得堡返回巴黎的一个傍晚，我前往曾是希腊咖啡馆的街角处赴某人之约。在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附近 我下了出租马车 走上人行道。人行道上斜阳映照 荡漾着菩提树的阵阵香气。大街上热浪升腾 尘埃弥漫 奔跑着的人力车、马车 宛如悬浮在地面上一般。街上的小汽车比以前多了，但我并不以为这是什么好事。当然 应当承认的是 这种对于小汽车的时髦崇尚 在巴黎似乎还未像在彼得堡或莫斯科那样成为灾难。也许，这是因为欧洲都市王后、人称“光明之城”的巴黎极能包容外来的新事物 并将它们融化成自己的一部分吧，就像我经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她“收留”了我 并将我塑成了一个巴黎人。

大街两旁的一家咖啡馆仍像往常一样座无虚席，现在正是饭前喝开胃饮料的时间。巴黎人总爱在这时候坐下来，喝喝咖啡，逗逗乐子 审视自我 品评他人 或是为某一篇学术论文打个草稿，或是在咖啡桌的台布上勾勒一幅大型天棚装饰画的轮廓。这里距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不远，这样的咖啡馆并不鲜见，饮客中亦不乏大学生、教授、画家、作家等。人群之中还总是有一些外国游客，

大多是那些似乎世界上的钱财都装在他们口袋之中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一片喧闹声中 这些人只是不知就里地东张西望 却永远不能成为其中的一员。

像一只小猫趑趄于慈爱的主人放置的一碟奶油之前那样，我忐忑地慢慢走近那家街角食品店。

说来奇怪，就像一张风姿犹存的脸上会间或闪过那淡淡的已然逝去的青春影子，我的眼前时而浮现出铺子正面的几个烫金大字：“希腊咖啡馆”。于是 我似乎又回到了往昔那令人陶醉的岁月之中。那时 我正值豆蔻年华 充满着希冀与期待 这世界就像蝴蝶展翅即可拂开的牡蛎一样 新鲜美好 人似乎顷刻间便可扬名于世 生活中的爱就像街角处即将出现的来者一样实在可见 毫无缥缈。

希腊咖啡馆和埃科莱·朱尔绘画学校相隔只有两个街区之遥。当年我曾在朱尔画校学画，后来又在其中执教。从咖啡馆步行不远 就是我当初在圣伯努瓦街的住所 摸索着爬上昏暗、狭窄、摇摇晃晃的五层陡直楼梯，来到那顶楼的单间栖身之处。

眼前的食品店橱窗中 挂着条条腊肉 片片火腿 串串香肠 陈列着滋补酒、葡萄酒和白酒。橱窗上雕刻的千姿百态的希腊众神竟依然存在 它们曾是当年希腊咖啡馆富有代表性的装饰画面 也曾使来这里的艺术家们灵感大发。他们有的是蜚声画坛的大师，有的是初出茅庐的新手 把一些嘎吱作响的椅子垒成个小山 攀上去在那顶棚上欣然作画。也许 这食品店的主人并不知道 那上面还曾有过我的一幅画像呢，如今已被刷上了一层白灰。记得是醉醺醺的保罗·戈甘试了一下而未能爬上椅子，是亲爱的亨利推开众人的扶持 登上高处 以成竹在胸的精巧笔触，一下子就勾出了我的侧身像。而现在 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永远、永远地成为过去了。

思念至此 我禁不住热泪流淌。伫立在这夕阳之中 眼前的景色 耳中的声音 周围的香气 似乎都和过去一样。我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代那一去不复返的日子。那时，我对一切是那样的充满勇气、信心和力量 我曾享受过异乎寻常的幸福 也经历过不堪回首的深渊挣扎之苦。然而，这些都不是我此刻泪水横流的原因。

念及人生的虚空，想到我最终做出的错误抉择而可能经受的孤独时 这泪水是宣泄的泪 更是深感宽慰的泪。

如果 一切不是那样发生的话……

第 一 部

巴 黎

第 一 章

我受洗时取了我母亲安娜的名字，全名叫安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卡列尼娜，但人们习惯叫我安妮。我的爸爸——直到十八岁我都一直认为他就是我的亲爸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①是政界的高官，相当有钱，人们都十分尊重他。我的哥哥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昵称谢廖沙^②比我大九岁，一出生就在沙皇侍从军官团中挂上了名。不用说，这是未来在禁卫军中谋得一官半职的阳光大道，而一旦如此，就在皇室中争得了一席之地。这在当时的俄国社会中是个十分保险而又不易争得的位置。

在我最初的记忆中，谢廖沙是个表情严肃的男孩，沉默寡言，别人追问他什么事时会刷地一下满脸通红。他和我一样，肤色微黑，这都是从我们死去的母亲那儿继承来的。一幅由米哈伊洛夫画的我母亲安娜·卡列尼娜的画像，现今还悬挂在彼得堡我那小起居室中壁炉的上方。那是一幅充分揭示了她青春美的全身像。一头乌黑发亮的秀发微微弯曲着，裸露的双臂和肩头毫不掩饰地显示着她身姿的优美。我可永远不敢奢望有如此美妙的身段。而且据我所知，米哈伊洛夫对他画笔下的人物没有作丝毫的夸张，我母亲确实是个美人。

我知道——我想，从我朦胧地知晓育儿室外面的世界时就已

旧译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卡列宁。

^② 旧译谢辽沙。

经知道——我母亲的死有着某种异常悲惨的隐情。对于大人们行为的细微变化 对于他们的突然沉默不语 或者为了不让孩子们听懂而断断续续地交谈 甚至对于大人们扬一扬眉毛 孩子们都十分敏感。多少年来 代代如此。然而 令人奇怪的是 每一代人又都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

每当我问及“我妈妈是在哪儿死的 怎么死的”时 爸爸总是支支吾吾的 或是突然叉开话题 避而不答。这使我逐渐变得谨慎起来，慢慢地很少问他了，到后来只向佣人们打听。有一次在彼得堡，我直接向我们家的厨师——她是个心地十分善良的好女佣 根本不会在孩子们面前说假话——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她一听就撩起围裙捂在脸上 撕人心肺地嚎哭起来。从那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问过她。

同我的哥哥谢廖沙谈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这主要是因为，到我懂事的时候，在我的眼中他已长成了大人。穿着一身华丽而又显得十分威严的军服，因为在侍从军官团中表现出色而得了一枚铜质勋章 而且成了一名好骑手。当然 我还记得 爸爸原本希望他能得到一枚金质勋章，在禁卫军于红村举行的赛马中至少能获得一次第一名。

我的家庭教师泰勒小姐是个英国人，出身于萨福克郡的一个自耕农家庭。十分明显，有关我母亲的死的秘密她全然不知。刚来我们家时 泰勒小姐一个俄语单词都不会说 十年之后 仍然如此。在我们家 除了偶尔与佣人或农民聚会时讲点俄语外 其它时候只讲英语和法语。我的祖国的统治阶级与下层社会群众——少数头脑发热的所谓革命者除外——之间，不仅有着出身和教养不同的隔阂 而且有着所用语言不同的障碍 但却受到他们的普遍尊崇，这一点使我百思不得其解。

泰勒小姐对于我母亲的命运一无所知，但她在数学、希腊语、

拉丁语、音乐及绘画方面却造诣颇深 而这些正是我十八岁之前所学的主要课程。从很早的时候起——我想这是我那家庭女教师热心指导的结果——我应感到，我在用画笔和铅笔作画方面有着特殊的才能。记得有一次——而且记得这不是第一次我这样恶作剧——我用木炭在通往凉亭的白石板路上画了一条和真的一样大小的蝰蛇，一个女佣见了吓得尖叫起来，叫来两个身强力壮的男仆 拿着扫帚和铁锹消灭那条‘毒虫’。

我十八岁那年 泰勒小姐说服了我爸爸 把我送到瑞士洛桑的女子精修学校^① 去学习一年，以完成我的学业，并在其中接受上层社会各种优雅举止和礼节的教育。

泰勒小姐将送我去瑞士。在我们出发的前夕，爸爸把我叫到他的书房 而平时这块‘宝地’是很少让我进去的。

爸爸坐在他那铺着皮革台面的大写字台后面，我走进书房时，他立即站了起来，十分有礼貌地朝我点了点头。对于同他社会地位相同的人到地位最低下的农民 根据对方不同的等级和性别 爸爸总能表示不同等级的敬意 在这方面 他始终做得恰到好处 精确无比。

“亲爱的安妮 你的脸色非常苍白 是病了吗 何不推迟一个星期出发呢 你们学校要到九月七日才开学 而且校长通知我 鉴于你的旅途遥远 在到校日期方面将给予你特殊的宽限。噢 你怎么不坐下呢 亲爱的？”

可怜的爸爸，单独同我在一起时总有点不知所措。他是那么的和蔼可亲 虽然有很多人认为他冷若冰霜 颇难接近。我始终对他非常崇敬 这样做是对的，也是应该的。但有些时候 在那人们

^① 为已受普通教育的青年女子作进入社交界准备的一种学校，内授音乐等课程——译注。

把自己心灵深处的隐秘翻将出来反复捉摸的深夜 我常常想 是什么魔力曾把这样一位行为拘谨、性格孤僻的政府官员同米哈伊洛夫画笔下的那个绝色女子结合在一起的呢？那张画就挂在他的书斋中 虽然令人奇怪的是 不是挂在他的对面 而是挂在他背后的墙上。

“谢谢 爸爸。”

我们的谈话用的是英语。

我在爸爸对面的一张靠背椅子上坐下，面对着安娜·卡列尼娜的画像。

“你的行装都已打点好了吧 安妮。泰勒小姐也准备好了吗？”

“是的 爸爸。”

“钱的问题，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我已告诉我在苏黎世存款的银行 按你每月所需的花销把支票发往学校 你可直接向校长德沃夫人支取。”

“谢谢您 爸爸。”我回答道。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站起身来，双手背在黑色礼服大衣的后摆里面，大步走到窗前。阳光把他那秃顶周围的一圈灰白头发照得分外清楚 他的头颈像拔了毛的鸡脖子一样干瘦无肉 他的背已经驼得相当厉害。我发现，爸爸仿佛突然间成了垂暮老人。

他大声清了清喉咙 说：“安妮 亲爱的 你是不是认为 哦——你的成长是幸福的？你是不是这样看？请你对我实说。”

“我是这样认为的 爸爸。”

“好的，好的。现在要到洛桑女子精修学校去完成你的学业，你也是愿意去的？”

“是的 爸爸。”

“很好 很好。”他似乎感到十分宽慰 转过身来。他的眼睛——自我上次有机会同他较长时间地待在一起以来，那眼中的眼

白似乎又黄了许多——爱抚地望着我。我心中一动，从我儿时的记忆中这样的目光好像见过不知多少次。

“那么，你是不是非常快乐？”

“非常快乐，爸爸。”

“好好。”说着，他又转过身去。

窗外，越过广场，就是灰红相间的花岗岩砌成的涅瓦河河堤，远处还有船坞和城堡。望着这种景色，他继续说：

“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也就是说，必须让你知道某些事情的真相。”他顿了顿，也许是意识到自己又在用官场的口吻说话了，“最好是在我们道别之前对你说清楚。”他话未说完就停了下来。

“什么事，爸爸？”

“关于你妈妈安娜·阿卡蒂耶芙娜的事。”

（天哪，我妈妈的事，难道我就要听到那使我们的好厨师把围裙蒙在脸上失声痛哭的事实真相了么？）

“亲爱的安妮，你的母亲是位美丽非凡、极富天资的夫人，可能是——也许是——我对她的前一种资质注意得更多一些。我想，也许是，”说到这里，他用手抹了一下眼睛，叹了一口气，“也许是因为她端丽的品貌和良好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因为她的聪慧睿智，我才娶她作为我的妻子。这对我来说更为不幸，对她来说也是如此。”

我一言不发。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我们都有自己的过失，亲爱的安妮，”他说，“我的过失是对她怠慢、疏于理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对这种过失并不怎么追究。但你母亲的过失，却是世人共斥的。对于一个女人来说，那就是——。”

“我母亲的过失是什么？”我轻声地问。

“不忠。”

“啊——”我不由得抬起头来凝视着对面画像上那肤色微黑的美人她袒胸露肩，嘴上挂着永恒的微笑，透出一股不可名状的温情。“不忠”我，一个未经世事的十八岁的姑娘对于这两个字的含义又能懂得多少？！但实际上，我懂得的——或者说是猜想到的——比我愿意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承认的要多得多。突然，我心中感到害怕起来。

爸爸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双手仍背在后面，交叉在他大衣的尾摆下，灰黄的脸绷得紧紧的，颧骨至下巴处纹路清晰可见，我从未见到他的脸色像今天这样难看。

“曾有一个名叫沃伦斯基^①的年轻军官，他说：‘他是一个具有非凡天才与和蔼性格的贵族子弟。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能像他那样，走进一间屋子就能唤起所有在场的人的热情、兴趣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安娜倾心于他，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种倾慕是相互的，也是必然的。安妮，亲爱的，也许这一点会使你感到莫大的不安。但是，我还得继续说下去。’”

我知道，下面要说的是怎么了。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即将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但这位慈爱的老人还在犹豫不定，我不能让他用自己臆造出来的酷刑工具继续折磨他自己了。我的双唇间一定是不由自主地蹦出了这难以启齿的事实。

“爸爸，我想，您是要对我说，我是个——是个私生子？”我低声说道。

“亲爱的孩子，我的安妮！”他转过身来。我心中一阵颤抖，看到他那疲惫的双眼中闪烁着泪花，如果这可怜的孩子竟然使

你用这个字眼的话 我就应该尽一切所能 ,一切的一切 来防止你这样做。”

当时 ,一定是我那正视现实的习惯占了上风 因为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 ,我是这样轻声对他说的 :

“ 但这是事实 是不是 爸爸 那么 又何必拐弯抹角呢 ?”

他慢慢地在他的椅子中坐下 , 一只手抹了抹他那凝了薄薄一层汗珠的灰白的眉毛。

“ 是的。”他说 ,“ 你的母亲非常希望离婚 可我踌躇着拿不定主意 愤怒、自尊、妒忌撕扯着我的心。最后 我拒绝了她离婚的要求。这时 , 你已快要降生。你最后是以合法婚生孩子的身份来到人世的 , 但你真正的父亲是阿利克谢 · 基里洛维奇 · 沃伦斯基伯爵 。”

“ 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 我问道。不过 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 还有。

“ 还有很多 安妮。”他低声说。

“ 我的——我的父母亲出了什么事 ?” 我问道 ,“ 您为什么要把我领回来 像您亲生的女儿一样抚养成人呢 ?”

“ 为了表示我的忏悔 孩子 我要照顾你。”

“ 忏悔 忏悔什么 ?”

他那无神的眼睛避开了我的目光。他沉默了一会儿。待他回答我的问话时 就又恢复了他平日的刚强 望着我 头仰得高高的。

“ 是我害死了你的双亲 , 就像是我亲手用子弹打死了他们一样。因为我拒绝离婚 结果把他们——一对年轻、执着的情人——逼到了一个与社会毫无联系的昏暗世界。起初 , 一切还好。沃伦斯基非常有钱。他们俩到处旅行 在莫斯科、彼得堡及乡下都置下

了一些小宗房产。沃伦斯基从未丢下过他所酷爱的赛马这项体育运动。”

“然而，他俩走上了一条最终必然要导致悲剧的路。安娜·阿卡蒂耶芙娜原是社交场中一颗闪烁的明星，而现在却不折不扣地成了被社会所遗忘的人。如果沃伦斯基理解她的需要，也许一切将会相安无事。但是，他开始觉得安娜喜怒无常，老是抱怨。于是他越来越多地同他仅剩的几个朋友厮混在一起。当然，所有这一切仅仅是我的猜测。很可能——很可能是你母亲认为沃伦斯基对她已经厌烦。也许是因为这个，也许是由于其它的原因，在一个下着毛毛细雨的日子，她一人登上了火车。当她到了目的地——当她下车走到月台上时——她……”

他的脸深深地埋在双手之间，开始像发疟疾似地浑身颤抖起来。我快步扑到他身边，搂着他的双肩。他已经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了。

“别说了，爸爸。如果这事使您这样痛苦的话，就别说了。”我央求着他。

他靠在我的肩上继续说着，声音时断时续。

“那时正有一列货车经过，有人看见那火车开得很慢，她有意地躺在了前进的车轮下面，谁也没来得及阻止她……”

“别再说了，爸爸，别说了！”我大声哭叫着。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似乎卸下了心头沉重的负担，灵魂获得了莫大的安慰，平静地向我叙述着，他是如何经过深思熟虑，下定最后的决心，规劝沃伦斯基伯爵，为了我的最大利益，得把我当成他合法的女儿，谢廖沙的妹妹抚养成人。由于悲痛和悔恨而变得近乎疯狂的沃伦斯基（人们正正规规地请他去辨认他情人那血肉模糊的遗体！）当然是不难说服的。

接着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带着某种引为骄傲的口吻说到了我的生父。

沃伦斯基伯爵认为自己实际上参与了毁掉我的母亲这件事，并以实际行动表示了他的忏悔。他加入了一支俄国志愿军，去帮助小小的塞尔维亚 同残忍的土耳其苏丹的大军作战。在那儿 在那遥远的巴尔干半岛上，我的生父为了自由事业献出了生命。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脸色严肃 带着阴郁庄重的虔诚，从他写字台的抽屉中取出一个红色的皮匣子，里面放着一枚漂亮的金色徽章，徽章上配着红色、银灰色相间的绶带。他告诉我 这是一枚塞尔维亚白鹰勋章，是米兰一世国王在塞尔维亚王国复国之际追授给沃伦斯基伯爵上校的。这位俄国英雄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做了那么多 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爸爸还说 现在这勋章属于我了 因为这是沃伦斯基的母亲临终的遗愿。爸爸又说 这位夫人生前一直固执地拒绝见一见她儿子的骨血。

出人意料的是 面对沃伦斯基伯爵的勋章 我所受的教养在我身上建立起来的自我控制的高墙竟然崩塌了。眼泪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我请求爸爸让我离开他的书房。可怜的爸爸 我长这么大他从来没有拥抱过我 除了有时敷衍地亲过我的双颊外从来没有吻过我。此刻见我离开 他只感到一阵宽慰 却不知怎么安慰我。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 伤心地嚎哭着 为了安娜·卡列尼娜的悲惨结局 为了可怜的爸爸 也有一点为了我自己。

然而，我却无法使自己去想沃伦斯基伯爵。

在泰勒小姐和我出发之前，我又同爸爸谈过一次。那天午饭时，我心潮起伏，一点食欲都没有。我把盘子里的饭菜拨来拨去，堆到盘子周围，真希望这些饭菜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爸爸还是老习惯，一片黑面包，一杯白葡萄酒，三粒不同的药丸。

简单的午餐过后 爸爸拉着我的一只手 出了餐厅 走进旁边的花房。

时值盛夏 外面阳光灿烂 颇有热意 这是彼得堡所特有的那种夏日。但这花房中却凉意袭人 喷泉溅起悦耳的响声 玻璃屋顶的花房中人工挖成的排水道四面伸展 水深隐约见底 各种各样的蕨类植物一片浅绿。这一切都像是有意用来拂去眉头的燥热，抚慰重负的心灵似的。

“关于钱的事 亲爱的安妮，”爸爸说，“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会给你和谢廖沙各留下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这笔钱如果存在圣彼得堡的银行中 在你将来结婚时 足够你置办一套像样的嫁妆 如果你选择独身生活 不管多长 哪怕是一辈子独身 这笔钱也够你用一辈子，按照你现在的的生活方式用一辈子。”

“爸爸 您想得太周到了。”我紧紧地抓着他的胳膊说。他的胳膊摸上去就像是小鸟的翅膀一样 瘦得可怜。”不过 不要说什么您离开这个世界的事了。喏 您会活到很大很大的年纪 看着谢廖沙的孩子 还有我的 长大成人。这一点我毫不怀疑。”

“不 我不会活那么长的 安妮。”他平静地说。

我和爸爸心里都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屋外的车道 上传来一阵阵马具的叮当声 马蹄的得得声 车轮的吱嘎声。透过花房的玻璃墙，我看到卡列宁家的几个男仆拿着我的箱子，正沿着那带有栏杆的回转阶梯往下走。泰勒小姐也已出来 头戴遮阳帽 肩披方巾 手上是露指长手套。她轻盈地步下台阶 朝等待在那里的马车走去 脚上钉着小扣子的靴子在阳光下一闪一闪。

“你从我这里所继承的财产足够你生活 但绝不显眼 这样可以避免有人专门为了钱财来打你的主意，亲爱的安妮。”爸爸说，“我一想到假如你继承了沃伦斯基的财产所可能面临的命运 心中

就十分不安。本来 如果你是他们的婚生孩子 或者 如果沃伦斯基伯爵轻率地留下一个由你继承财产的遗嘱，这种事就会发生的。”

“ 是吗 ?”我嘟哝着 不明就理。对于这类事我是一窍不通的。

“ 他有五千万卢布，’爸爸说“，存在彼得堡银行里 年息百分之八。这些钱将在那儿永远永远地存下去，因为没有人冒着上法庭打官司的风险去要这笔钱 谁想冒这个险 只能是朝律师的口袋里再多送几个钱。不继承这五千万卢布是你的运气，安妮。对于一个男人 一个精明的实业家男人来说 用这样一大笔钱财可能建立起一个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英国、德国的那种庞大的帝国工业。但是 对于一个年已及笄的女子来说 这笔钱将是一种灾难 将会使她成为那些专为钱财而来的登徒浪子们猎奇的对象。 ”

我不由得想到了我那可怜的妈妈 她没有别的 有的只是她的端庄、美丽 但这却给她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毁灭。

听着爸爸的叙述 我无言以答。

“ 噢 你该出发了。’他说。

我最后看到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 那悲惨地结束自己一生的安娜的丈夫，正在台阶下面向我挥手。从那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活着的他。因为不到一个月，他就去世了。后来我才知道 医生早就警告过 他的寿终之日已经为期不远。

第 二 章

我没有回俄国参加爸爸的葬礼——这个结果也许是他生前有意造成的。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死后，装在一口大理石石棺中，葬在莫斯科近郊卡列宁家庭领地的陵园内，就葬在我那惨死的母亲的旁边（反抗这些习俗的罪人已经安然死去 俄国的习惯势力仍是这样万古不变！）

两个星期前 校长德沃夫人把我叫到她的书房 平静而又婉转地将爸爸的死讯通知了我。

对我来说，这个消息并不十分突然。早在穿越欧洲大地的火车上，我就细细想过，为什么爸爸对我说出了我母亲和生父的往事 为什么他对我未来的经济保障显得那么关心 种种思绪串在一起 再加上他显而易见的多病的身体 使我得出一个结论 他已预感到不久于人世。现在看来，事情果然如此。

我伤心地哭了一阵 给谢廖沙写了一封长长的信 谢廖沙此时已在侍从军官团服役期满 但令人不解的是 他没有接受禁卫军给他授衔的提议 而去 上了牛津大学，从牛津大学又辗转转到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 现正在莫斯科大法院当实习律师)把我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最后一次谈话全都告诉了他，并请他以我的名义在爸爸的坟上献上一些鲜花，一些永不凋谢的鲜花 。

原文为法语——译者注。